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5.010

#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现状及对策

蒋军凤<sup>1</sup>, 禹华<sup>1</sup>, 刘会娟<sup>2</sup>

(1.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能发挥深刻的社会纽带作用, 有助于区域文化形象的建构, 有助于作品审美价值的提升。相对于东北、河南、四川、上海等地,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和影视创意的融合方式比较单一, 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明显不足, 应该从挖掘湖南文化的独特性、丰富创作类型、突出湖南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差异性、凸显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等方面发力, 对其进行拓展、提升。

**关键词:**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 影视创意; 方言影视; 创意融合

**中图分类号:** H174;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5-0072-07

**引用格式:** 蒋军凤, 禹华, 刘会娟.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现状及对策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5): 72-78.

##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Fusion of Hunan Dialect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vity

JIANG Junfeng<sup>1</sup>, YU Hua<sup>1</sup>, LIU Huijuan<sup>2</sup>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Music,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fusion of dialect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vity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play a profound role as a social bo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images and enhanc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works. Compared with northeast China, Henan, Sichuan,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the fusion of Hunan dialect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vity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there are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both content and form. We should explore the uniqueness of Hunan culture, enrich the types of creation,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nan dialect and Putonghua, and highlight the consistency of Hunan dialect and film and TV time and space, and so on.

**收稿日期:** 2020-09-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湘南土话和湘语特征比较研究”(14BYY033);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研究课题“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性研究”(2019hnwc04);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南汉语方言调查·湘乡”(YB1708A004);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项目“湖南汉语方言调查·东安”(YB1821A023)

**作者简介:** 蒋军凤(1972—), 女, 湖南东安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专家, 研究方向为语言及影视文化;

禹华(1985—), 男, 贵州贵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刘会娟(1984—), 女, 湖南茶陵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音乐艺术。

**Keywords:** Hunan dialect cultural resources;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vity; dialect film and television; fusion of creativity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 方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 方言影视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然而方言毕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沟通乡情、凝聚亲情的情感纽带。随着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的迅速发展, 方言影视逐渐兴起。南腔北调的情景剧《武林外传》, 广东电视台推出的《外来媳妇本地郎》, 四川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傻儿师长》, 东北方言电视剧《刘老根》《乡村爱情》, 河南方言电影《孔雀》《鸡犬不宁》《1942》, 贾樟柯的山西方言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 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方言文化的魅力。方言影视在全国范围呈现出失衡的发展态势, 比较而言, 东北、河南、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影视影响力较大, 观众接受度较高, 湖南方言影视的影响力则稍逊一筹。

学界就方言影视的热播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方言影视热播原因、方言影视传播的局限与对策、方言影视文化溯源、影视剧与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等方面, 相比而言, 将方言文化资源和影视创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从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仅查阅到一篇将河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结合起来研究的论文, 尚未查询到将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

基于此, 本文试运用社会学方法、影视本体论方法等探讨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 以期能为湖南方言影视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为湖南影视产业的发展、湖南文化产业的振兴贡献绵薄之力。

本文将从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的意义、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现状、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如何融合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 一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的意义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的主要成果体

现为方言影视作品, 因此,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的社会意义需要结合方言和方言影视的传播来谈。笔者认为, 方言和方言影视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纽带作用、区域形象构建以及审美价值的提升是这一融合最主要的意义。

一是社会纽带作用。“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念, 方言能提供深刻的社会纽带, 这种社会纽带靠不自然的‘标准语言’是无法建立的。”<sup>[1]</sup> 社会纽带, 即行为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社会纽带包括依恋、投入、参与和信念四种成分。笔者认为方言主要通过“依恋”和“信念”发挥其社会纽带的功能。

“依恋”在这里特指未成年人对传统社会长久持续的情感依赖, 尤其是对父母的情感依赖; “信念”在这里特指对法律或其他传统法则道德正当性的认可, 其以“依恋”为基础。

各个地方在历史绵延中形成了自己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这些地方文化正是当地人们的集体记忆。各地也形成了独特的方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方言当中自然蕴含着各地独特的人文历史和风俗人情。所以, 影视中方言的运用能使影片具有独特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 这种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是观众非常熟悉的, 方言的使用由此使得影视主题的表现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观众听到熟悉的方言, 再透过方言清晰而真切地感受到心灵深处的地方文化精神, 这样, 以该方言为母语的观众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而唤起对方言的怀恋、对故乡的思念, 进而不由自主地移情于剧中人物, 找到与剧中人物类似的生活支点和情感寄托。也就是说, 观众会因听到熟悉的方言感受到熟悉的地方文化, 进而消减与影视文本间的距离, 获得类似于狂欢节广场上的心理感受, 其情绪得到充分释放, 心灵获得满足<sup>[2]</sup>。由于方言的这种特性, 以其为纽带, 行为入能够迅速将自己与生活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 湖南方言影视的传播, 能够唤起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年轻人对自己生活的地域环境及文化习俗的记忆和留恋, 激发他们对家

乡的关心和热爱情感,进而使之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大业。于此可见,湖南方言影视具有强大的社会纽带作用。

二是区域形象的构建。英国学者钱伯斯认为:“我们不断地从电影、时装、杂志广告和电视中选择形象;它们代表现实,并成为现实,成为经验的符号和自我的符号。”<sup>[3]</sup>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人们常常需要借助传媒构建的种种形象尤其是影视作品创作的形象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因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既声像并茂、生动具体,又能传达潜在的情感和意识形态信息,因而具有其他媒介无法企及的优势。文化是区域形象的核心,文化形象的构建、塑造与传播更能凸显区域魅力。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影视传播对于文化形象的塑造与构建作用尤大,因为方言影视承载着地方文化精神,方言影视的传播更有利于传播区域文化形象并彰显其魅力。

纵观近年来的方言影视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方言影视作品因其类型化特征,确实强化着区域内外人们对地域文化形象的认知与接受。许多地区将具有方言品质的地域文化与影视结合,获得了非常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比如,四川的《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功传播了四川文化精神;《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闯关东》等电视剧的热播,成为人们了解东北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也就是说,湖南方言影视文本中的形象同样能够成为受众认识湖南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形象,受众能够对湖南形成一种印象和评价,从而完成湖南方言影视对区域形象的构建。

三是审美价值的提升。方言和影视两者都可以单独作为审美客体,为受众带来独特的审美享受,如方言本身就有民俗文化美、意境美、结构美、音韵美等美学特征,而影视的服装道具、灯光布景、视听语言等也都有其特殊的美学特征。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能使影视作品呈现出更多不一样的审美意义,这可以从“营造喜剧性”“突出陌生化”和“强化真实性”三方面进行探讨。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能够利用方言特殊的语音语调营造特殊的喜剧效果。随着国家加大推普力度,国家广电总局制定了一些规定,

例如“电视剧的语言(地方戏曲片除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但长时间面对清一色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观众难免产生审美疲劳,方言影视的出现则让观众耳目一新。相比较而言,方言里有比普通话更丰富生动的生活用语,对事物的描述会更加形象,也更加生动幽默、有趣传神。方言的使用能给受众带来愉悦、放松的感受,从而满足受众娱乐和审美的需求。方言影视可以通过对方言的语音、语义等进行扭曲、夸张、重复、异化等方式来制造幽默效果,也可以通过方言与人物、环境的错位来营造诙谐效果。如《疯狂的外星人》中,外星人附身在头上带着能量环的欢欢身上后,再次恢复了外星人的能力,于是大骂耿浩“流氓土鳖三孙子,瓜皮无赖臭狗屎,龟儿子,顶你个肺啊,扑街仔”。这里,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广东方言连续出现,打破了观众原本的心理期待,使之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艺术的技巧之一是使对象陌生化,而语言的陌生化恰恰是艺术陌生化的前提,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可以增加受众的审美快感。换言之,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可以通过突出方言的陌生化、增加受众感受的难度、延长受众感受的时间等方式,来增强受众审美的快感,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方言具有丰富的表达性,当地人觉得熟悉亲切;方言区外的观众则感觉陌生有趣,他们新奇之感往往由此油然而生,进而得到一种心理满足,有些方言词也因此流行开来。比如湖南电视栏目《越策越开心》就使得湖南方言词“策”一下子成为全国观众的口头禅,将描述湖南人吃苦耐劳、坚韧执着的“霸得蛮,耐得烦”变成了方言流行词。

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还能够强化影片的真实性,因为方言本身就具有浓郁的草根气息,更贴近生活的本真,而真实性是受众观影最基础的审美需求,其审美快感的生成建基于此。比如,《故事酒吧》《一千零一夜》《生活口味虾》等湖南方言剧就运用“崽”“蛮”“堂客”“挨晒”等极具特色的方言词汇,凸显了影片的地域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鸡犬不宁》的导演陈大明曾经说过:“我想拍一个豫剧的电影,肯定就要用方言,不然就不真实。”<sup>[4][12]</sup>还有学者提出:



“方言作为一种边缘性的语言, 其非主流的身份决定了在很多情况下, 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的对抗和冲突中, 它可以成为一种颠覆主流文化和经典文本、标示信息传播者群体或个人意识形态的工具。例如在反映战争、饥饿和社会问题时, 方言与纪录性往往是主要的美学选择。”<sup>[5]</sup>

## 二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现状及不足

传播学认为, 受众在接受媒介信息时有很大的主动性, 其主要表现为三种选择行为: 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受众总是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喜欢、赞同或愿意相信的立场或观点, 对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观点的接受表现得更加积极。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是具有差异性的个体, 具有很强的自主选择性, 这促进了影视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大众传媒的分众化趋势, 这也是湖南方言影视发展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众的呼吁, 广电总局对影视剧中方言的运用也逐渐放宽了限制, 这也为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提供了政策保障。由此, 湖南方言影视的创作得以不断发展进步, 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的方言影视作品, 例如情景喜剧《一家老小向前冲》《逗吧逗把街》, 纪录片《矮婆》《路》《村小的孩子》《生活而已》, 系列剧栏目《故事酒吧》《生活口味虾》《一千零一夜》, 文艺片《十八洞村》, 等等。其中, 湖南电视荧屏上播出时间最长、播出集数最多的电视剧《一家老小向前冲》, 在其播出的8年中一直保持良好的人气, 并制作出不同的方言版本进行发行, 成为湖南方言影视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综上, 近些年, 湖南的确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方言影视作品, 然而, 相对于东北三省、河南、四川、上海等地,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和影视创意的融合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诸多不足, 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湖南方言文化资源挖掘不够。近些年, 不少地区掀起了方言影视热潮。以河南为例, 2005年, 方言电影《孔雀》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成功; 2006年, 《鸡犬不宁》在西班牙连放四场; 《不是闹着玩的》和《就是闹着玩的》也赢得了很好

的口碑; 2013年, 电影《给你一千万》的播放再次引起强烈反响; 2015年电视剧《嘿! 真不是闹着玩的》收视率也极高。这些影视剧展现出新时期河南的形象和文化, 把中原文化推向全国, 让观众看到河南文化的兴盛, 其在传播河南文化的同时, 也增强了观众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也更有利于河南的崛起<sup>[6]</sup>。笔者认为, 当下湖南方言影视作品中方言文化资源挖掘不够, 文化层面上未能使观众产生强烈认同感, 当然, 湖南也就没能出现河南、东北等地的“方言影视热”。

二是融合方式有待突破。艾尔丽把方言影视作品分为三类: 纯方言影视作品, 如《刘老根》; 方言特色影视作品, 如《天下无贼》; 方言版影视作品, 如方言版《猫和老鼠》<sup>[4][111-112]</sup>。从电视角度来说, 新闻栏目、栏目剧是主打类型。

纵观当下湖南方言影视, 创作类型主要是“纪录片”“情景喜剧”, 方言电影极少; 有一些电视栏目用到方言, 但没有方言专题片、方言戏曲剧场等。我们称之为方言影视是因为其使用了方言, 但实际上这其中多数影视作品在语言使用上仍以普通话为主, 只是辅之以方言, 二者夹杂使用。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方式还比较单一, 其不利于湖南地域文化的传播。

## 三 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

针对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现状, 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展开对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融合的思考。笔者认为, 从内容上看, 要重视湖南方言的文化独特性, 深挖湖南的方言文化资源。从形式上看, 要突出湖南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差异性; 同时, 还要注意凸显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

### (一) 内容上充分挖掘湖南文化的独特性

湖南方言是湖南文化的载体, 湖南文化是湖南方言影视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其对湖南方言影视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设定、情节安排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认为, 湖南文化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历史角度出发, “红色文化、地域文化、理学文化和流寓文化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主体内容, 也是湖湘文化的四大支柱。”<sup>[7]</sup> 具体而言, 红色

文化形象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田汉、周立波、丁玲等；地域文化形象有湘绣、浏阳花炮、长沙臭豆腐、安化黑茶、湘西酸鱼等；理学文化代表有衡阳市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流寓文化代表有屈原、贾谊；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形象都可以成为影视创作主题、题材、创意的重要来源。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取材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历史；《血色湘西》取材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湘西麻溪铺镇一带抗日军民誓死捍卫家园的历史；湖南卫视《中华文明之美》之“中国特色小吃——米粉”则以湖南不可或缺的饮食文化形象“米粉”来结构全片；而中国僵尸片中的“僵尸”形象则很大程度来源于“湘西赶尸”这一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由此可见，从历史角度挖掘湖南文化的独特性，对湖南方言影视的创作也至关重要。

从发展角度看，湖南文化的形式、内容、作用可能会因社会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其独特性的来源。如，由于娱乐行业的日益发达，历史文化名城长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娱乐之都”“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这使长沙的城市形象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也使其文化形象更具国际传播性。再如，张家界因电影《阿凡达》的热映，将“南天一柱”景区更名为“哈利路亚山”，使其更具特殊性。这种因自身发展形成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湖南方言影视创意的重要来源。2017年，苗月执导的湖南方言电影《十八洞村》的创意直接来源于因精准扶贫而焕然一新的“十八洞村”这个独特的文化形象。湖南方言喜剧《一家老小向前冲》将镜头对准长沙，是因为长沙这座城市拥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属性，契合了影片表达新旧思想碰撞的主题。

从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是湖南文化的精髓，也是湖南文化独特性的体现。这种价值观念上的独特性对湖南方言影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影片主题的把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影片《十八洞村》中的麻妹对自己患病的孙女小南瓜说：“你活五十岁，我们就活一百岁，你活一百岁，我们就活一百五十岁。”这种质朴的语言不仅表现了这位传统苗族妇女的坚韧与担当，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湖南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念。

从方言角度考察，方言作为一个文化“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sup>[8]</sup>，蕴藏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方言自身也是一种文化样式。所以，湖南方言产品应当是影视作品重要的传播内容。

湖南方言资源丰富，湖南有湘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湘南土话、沅陵乡话等方言<sup>[9]</sup>，历来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湖南各地还有丰富的利用方言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化，如童谣、民歌、民间故事、顺口溜、谚语、歇后语、曲艺、戏剧、吟诵、祭祀词等。以曲艺为例，方言曲艺指地方戏，是方言与唱腔不断磨合的产物。湖南地方曲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花鼓戏。除花鼓戏之外，湖南还有很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戏，如湘乡皮影戏、零陵渔鼓、祁阳祁剧等。其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戏曲艺术，也是我们进行湖南文化传播的主要文化资源。

总之，从历史发展、文化内涵角度充分挖掘湖南文化，认识到湖南文化的特殊性，不仅能为湖南方言影视的创作提供可参考的素材与灵感，而且能为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指明方向。

## (二) 形式上努力追求多样化

一是不断丰富创作类型。笔者认为，湖南方言影视创作类型除了前文提到的纪录片、情景喜剧、栏目剧等外，还应强化商业类电影、专题片、方言综艺类节目等创作类型。

“方言+商业类型电影”的模式暂时还没有成为方言影视发展的主流方向，因为许多电影人认为方言与商业电影的融合在经济上可能存在一定风险；但河南、东北三省等地方方言影视作品的勃兴与成功，东北文化、中原文化因方言影视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又让我们看到了方言电影的魅力。湖南作为方言大省，也应当在方言电影的创作上有更多的作为。

另外，通过制作《湖南方言》系列专题片、方言综艺类节目展示湖南丰富的方言资源，结合民俗、地方文化，展示活态方言，介绍地方说唱艺术、戏曲等，再辅以设置方言栏目如方言新闻、方言栏目剧、方言戏曲剧场等，也是丰富方言影视创作类型的重要路径。

当然，在融媒体发展环境下，方言影视应明



确定位, 注重开发文化内涵, 保证内容制作精良。高水准的方言影视作品是对方言文化的尊重, 其可促进方言保护与传承。方言影视作品一旦释放出方言的魅力, 就会迸发出极大力量, 使得民众的凝聚力加强, 地方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区域形象得到更理想的塑造。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方言使用要考虑受众是否能够听得懂的问题, 否则, 再优秀的故事也无济于事。另外, 我们还要避免“有些影视剧为了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 将方言中糟粕的内容带进去”<sup>[10]</sup>的创作陷阱, 以免败坏方言影视的名声。

二是突出湖南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差异性。首先, 作为一种象征符号, 湖南方言和普通话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受众的心目中, 普通话作为一种主流的语言通常与“开放、时尚、信息时代”等概念相联系, 而方言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语言, 往往与“封闭、保守、小农经济”等概念相联系; 但影视创作却可以通过加大普通话与湖南方言在表意上的差异, 形成人物身份、地位、职业等方面的对比, 从而传达出创作者特定的思想与情感。在曾获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的《村小的孩子》中, 蒋恒、蒋鑫两兄弟在“CPLA 留守儿童筑梦计划”的帮助下, 观看到了父母给他们的视频留言。片中, 父母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与留守家乡的孩子所说的方言之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暗含了一种城市与乡村、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对比, 构造出一种父母与孩子间的疏离感, 这种被现实割裂的情感让人无奈又心疼。这种对比虽然不是导演故意策划的, 但是却可以看到其在表意方面的强大力量。苗月执导的《十八洞村》, 村民们说的是湖南当地方言, 而扶贫工作队的队员们说的则是普通话。通过语言的差异, 被救助者与救助者的身份直接区分开来。剧中的村民们因循守旧, 努力种田却无法摆脱贫困, 而扶贫工作队除旧布新, 因地制宜地迅速找到了十八洞村脱贫的方法。导演刻意通过普通话与湖南方言的差异, 凸显十八洞村村民与扶贫工作队观念上的不同, 凸显出了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当然, 在影视创意中, 湖南方言和普通话的象征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湖南方言也可以表现正面、积极的意义, 普通话也可以表现反面、消极的意义, 这种反差能够传

递创作者特殊的情感, 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例如, 《村小的孩子》中, 当蒋恒、蒋鑫与父母视频通话的时候, 母亲从之前的说普通话改为说当地方言, 不仅反应了母亲对家乡的强烈归属感, 还表现了母子之间那份无法割舍的亲情。可见, 凸显湖南方言与普通话象征意义的差异, 可以突出表现导演的创作意图, 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

其次, 湖南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语调以及词汇表达上存在明显差异。影视创作者们能够通过变换声调、平卷舌、押韵等语音手段以及运用拟声词、熟语、词内换序、词汇错位等词汇手段, 来夸大湖南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 从而创造诙谐幽默的效果。比如, 故意将“湖南”读成“Funan”, 将“知道”读成“Zidao”, 将“去”说成“Qie”, 等等。这种方法在“情景喜剧”中运用较多。由于受拍摄场地和制作经费的限制, 情景喜剧主要以情节和语言吸引观众, 而湖南方言从语音到词汇都可成为方言影视制造笑料的有力武器。例如, 《一家老小向前冲》中的方音语调, 《逗吧逗把街》中一些特征明显的方言表达: “不要怕堂客, 堂客又不是母老虎, 揍她几句, 必要时怕一下”, “要想生活无烦忧, 有事就把烟来抽”, 等等。

再次,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象征, 有时候在影视中只是作为地方文化或某一类人群的符号象征, 以区分普通话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主流人群。通过这种简单的符号划分, 能够让观众尽快了解影视创作者的意图。例如, 王岳伦导演的《十全九美》中, 运用了云南话、天津话、东北话、保定话、湖南话等, 通过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方言来迅速区分人物特征, 表现人物性格; 同时, 还能通过方言与普通话的错位, 形成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诙谐效果。

由此可见, 加大湖南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性表现, 不仅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情感、展现导演意图, 还能创造诙谐幽默的效果, 值得湖南方言影视制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三是凸显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词汇具有时代性, 一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方言词语可能只在某个特定时代使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便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比如, 1960年代的湖南方言流行词汇“红锅菜”(不放油炒出的菜)、“洋针”(别针)、“洋瓷碗”(搪瓷碗)等词语,

现在就很少使用。因此,影视作品构建人物台词时,要和人物所处的时代保持一致。李俊、杨光远等导演在创作系列历史战争电影《大决战》时,为了保持人物形象在受众眼中的真实感和亲切感,除了在人物外貌、服装上下足功夫外,还就影片中一些领袖角色说普通话还是方言的问题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其中,古月饰演的毛泽东说的就是湖南方言,演员表演时不仅在语音语调上尽量贴近了历史人物,在方言词语的运用上也尽量与人物所处年代一致,这样既尊重了历史事实,也满足了受众的期待,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

其次,影视创作要根据地域的不同选择相应的方言,因为方言是影视真实性的来源之一,而方言与地域的一致性还原影片情节和人物真实性的前提。例如,湖南导演蒋能杰创作的留守儿童三部曲采用的就是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本地的方言,其属湘语区范畴。《十八洞村》运用的则是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本地的方言,其属西南官话区范畴。

在此基础上,创作者们还可以运用一些艺术手法来突出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从而增强影片的真实性。例如,影片可以运用“跟拍”“长镜头”的方式,在展现影片时空连续性的同时,也为同期声的使用提供条件,将人物的方言真实地记录下来,突出影片的纪实性和真实性。影片在拍摄人物采访、人物对话时,还可以多采用中景、近景的景别,这样既可以突出人物语言的魅力,使受众与作品人物产生强烈的交流感,又能展现作品人物所处的时空。这些方法在加强影片真实性、客观性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效,也是突出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一致性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影视创作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方言影视类型灵活运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推动湖南影视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其还能发挥深刻的社会纽带作用,有助于区域文化形象的建构,有助于作品审美价值的提升。纵观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现状,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诸多不足,我们可以通过挖掘湖南文化的独特性、丰富创作类型、突出湖南方言与普通话间的差异性、凸显湖南方言与影视时空的一致性,加强湖南方言文化资源与影视创意的融合,推动湖南方言影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参考文献:

- [1] 韩 鸿. 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1): 69.
- [2] 邓 丽, 马 琳. 论东北影视剧与地域文化形象的传播与构建[J]. 文化学刊, 2010(4): 161-165.
- [3] 周 宪. 视觉文化与现代性[J]. 文化研究, 2000(1): 43.
- [4] 乐晋霞. 河南方言产品的类型及其在中原文化传播中的现状[J]. 传播与版权, 2016(1).
- [5] 詹 璟. 方言影视勃兴的社会语言学解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0(4): 279, 284.
- [6] 崔艳艳. 影视创意与河南方言文化资源开发[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6): 42.
- [7] 曾耀农. 论湖湘文化对湖南影视作品的影响[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1(3): 68.
- [8] 丹妮斯·姆贝. 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 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 陈德民, 曹庆, 薛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2.
- [9] 陈 晖, 鲍厚星.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J]. 方言, 2007(3): 250-259.
- [10] 张夏凡. 影视创意与河南方言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J]. 大众文艺, 2016(6): 200.

责任编辑: 黄声波